

## 中国作家们如何想像 中国的未来？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提倡乌托邦观念而诞生的。1902年，内外交困的清朝已走到穷途末路，梁启超在新创办的杂志《新小说》(New Fiction)中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The Future of New China)。小说以概述2062年——即小说虚构的出版日期2002年之后60年——繁荣的中国为开篇。在大中华共和国公民庆祝建国50周年之际，孔子的第72代后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孔弘道(Kong Hongdao)，应邀在上海的万国博览会上，就中国民主的实施情况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热情的听众，包括来自海外的数十万人。

如果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宏大开篇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那也许是因为这个新中国的“未来”在现在这个千禧年里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在中国崛起为世界领先的政治和经济强国之际，中国不仅主办了一届世界博览会，还举办了奥运会，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距离中国甚远的地方，如巴基斯坦和卢旺达，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社会主义中国可能已经实现了梁启超笔下未来的乌托邦。实际上，仿佛是重拾梁启超在一个多世纪前留下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在2013发表关于“中国梦”的讲话，将新中国的未来展望为“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力量”共同繁荣的景象。

尽管“乌托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词汇中一直是一个可疑的词，但“中国梦”却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它唤起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和文化视角。事实上，“中国梦”可能代表对最近一系列关于未来中国的讨论的总结。从“伟大的民族正在崛起”到“天下大同”，从“重新政治化”到“三教合一”——儒家、毛泽东主义、邓小平主义，我们看到大量的论着和宣言，全都渴望通过各自的观念打造强大的中国政治。尽管这些论著通常不以文学方式来写作，但它们仍然指出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的修辞姿态和想像能力。它们分享“宏大叙事”这个非同寻常的模式，让我们重新思考乌托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表现。

“乌托邦”是严复于1890年代后期翻译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中，作为新词纳入汉语词汇的。严复在注释中，思考君主统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认为教育和启蒙是国家繁荣的关键。严复在诠释乌托邦的过程中，淡化它是一种虚幻的构造这一事实。相反，他认为乌托邦是任何致力于适者生存的国家都要实现的目标。换言之，他把乌托邦等同于一个以他向往的达尔文(Darwinian)伦理为基础的目的论项目。

严复提出乌托邦思想的方式，引伸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关于他那个时代文学的工具性。也就是说，文学的“虚构性”只有在被证明是表现历史经验或期望时，才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小说被认为既是改造中国的目的，也是改造中国的手段。为响应严复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通过改革中国小说来改革中国的主张，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一番名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如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和民族，或者如我们所关注的，乌托邦和历史，都变成了可交换的观念。

乌托邦是中国现代文学萌芽阶段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除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和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所想像的不是一个中国重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未来时代，就是一个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理想国家的令

人难以置信的背景。晚清作家通过创作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切实际的作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设定了一些条件，既是一种新的政治议程，也是一种新的民族神话。

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热潮在1920年代的五四时期就消失了。作家似乎全神贯注于现实主义的经典，甚至不能接受任何异想天开的想法。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少数非写实作品中，成为常态的是反乌托邦，而不是乌托邦。沉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老舍的《猫之城》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

但是乌托邦找到一个新场合——共产主义的话语一来展示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愿景之上的：通过彻底改变现状，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应许之地”。因此，文学只是描绘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从1942年至1976年，乌托邦的比喻在中国主流文学中一直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无论过去和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人们都认为党和国家应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最美好的世界”。

与乌托邦相结合的是科学幻想，这是一种以科技方面的奇迹和创新为特色的流派，服务于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议题。学者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指出，作为“向科学进军”的运动的一部分，该流派曾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短暂盛行。四人帮倒台后，这一流派在1970年代末又曾一度卷土重来。正如瓦格纳所言，它又肩负起一个新角色，即“游说文学”，“以幻想的形式呈现科学家的集体愿望，并描绘出如果科学家的要求得以达成，他们将如何在更大的社会框架内大展身手”。

乌托邦和科学幻想在20世纪末经历了一次模糊的转变。尽管政治上阴霾不断，作家却能够创造出更多个人愿景，因此，他们让我们想起其晚清的前辈。例如，保密的《黄祸》（1991

年)从末世的角度审视被内战和核浩劫吞没,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大流亡和新“黄祸”的中国。梁晓声的《浮城》(1993年)则描述中国东南部一座大都市神秘地脱离了大陆。通过把中国想像成处于奇迹般复兴或永久毁灭的边缘,或者预言中国将成为核灾难过后的荒地和煽动新“黄祸”的地方,这些作家创造不同的时空地带,借此来思考国家的命运。

新世纪的到来,见证着写作和阅读乌托邦以晚清时期的气势出现复兴。讽刺的是,你会发现很少有作品可以按传统定义被描述为乌托邦式。这些作品的特点更恰当地说,正好是反乌托邦的。在韩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2066: Red Star over America)中,2066年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者想像美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灾难,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花园般”的超级大国。因此,韩松似乎认同一个自晚清以来就萦绕在许多作家心头的复仇主义幻想。但是韩松还有更多信息要告诉我们。据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屈服于“阿曼多”(Amando)。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预先规划每个人的生活,并用尽各种可能的方式监督其幸福。即便如此,当神秘的“火星人”降临地球时,阿曼多随即崩溃,令中国变成一个“福地”(并非巧合,这也是中国人对“墓地”的委婉说法)。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2007-2010年)具有史诗般的规模,故事时间跨越数百万年。这部传奇故事将“文化大革命”与星球大战、历史悲情与太空奇观融为一体,应被视为中国当代小说中最雄心壮志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一场幻想的奇观,也是对奇观伦理的探讨。“三体”讲述一位女科学家为报复她父亲在“文革”中遭到的迫害和冤死,邀请外星生物“三体”入侵地球。一群中国人被征召来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全球浩劫。这些英雄穿越时光隧道,使用巧妙的战术来进行宇宙大战。然而尽管如此,长远而言,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仍注定要被毁灭。

然而,我们却是在诸如北京作家陈冠中的小说《盛世》

(2009年)中,看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最为激烈的争论。小说以2011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开首,中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的经济都陷入瘫痪。多亏了英明的国家领导人之带领,中国才得以利用这次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团结。因此,早在2013年,中国就可以吹嘘盛世——一个繁荣的历史时代——的来临。尽管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对黄金时代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迹象,比如一种被称为“嗨赖赖”的欢庆情绪和大规模的健忘症,引起少数不遵循常规者的怀疑。为了找出真相,他们绑架了一名国家领导人,但了解到的却是一些他们无法想像的真相。

《盛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的,让人想起《新中国未来记》,尽管熟悉梁启超小说的读者会对充斥在《盛世》中的种种悖论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革命60年后,中国已经实现梁启超在20世纪初时梦寐以求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似乎已经屈服于党国的仁慈霸权。陈冠中将2013年当作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的一年,令人不可思议地预示着习近平宣布“中国梦”。

与《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或《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盛世》不太在意揭露一个看似良性统治的邪恶阴谋,反而更着重讲述故事的另一面,从而令被绑架的国家领导人出乎意料地成为英雄。这位国家领导人温文尔雅、沉着冷静,还略显疲倦,他彻夜且直言不讳的自白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在他看来,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让人民幸福。为此,政府必须采取从“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化”到思想控制等一切必要手段,以“维护社会秩序”。

我们还被告知中国人民的饮用水中被加入“摇头丸”(MDMA)成分,有助他们忘记任何妨碍健康的革命记忆的事情。这种生物政治片段是科幻小说中一个可以预见的情节。陈冠中真正要强调的是,在他讲述的这个故事中,这位“国家领导人”不仅是个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位最吸引人的故事作者。他关于即将到来的“黄金

时代”的故事，被证明是一剂制造举国狂喜的更有效药方。

中国的乌托邦就这样绕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原点。我们已经得出一个崇高的结论，虽然从更多意义上是“虚幻的崇高”而不是“毛泽东主义的崇高”。然而，陈冠中在小说结尾还是安排故事中的异见人士背弃黄金时代。这个结局让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在其《影的告别》一文中的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